

## 推进构建中国自主的中东研究知识体系

周 烈 晁 涛 金忠杰 田文林 殷之光

**摘 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指示后，中东研究学者更加重视“构建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这一现实问题。学者们既需要转变认知范式、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构建路径，又需要结合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以中国为方法的方法论自觉。面对新的时代任务，中国中东研究学科建设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外交定位与科教兴国战略、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以及中央人才工作战略等三个重要基础，积极培养自主知识型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队伍。在建构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区域国别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既要避免陷入“中国中心论”的误区，又要批判吸收西方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中的有益成分。也就是说，对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的思考，其原点是对霸权关系的反思，及在此基础上围绕平等关怀展开的对战争、和平与发展的理论与制度性思考。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中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周烈，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教授（杭州 310023）；晁涛，博士，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91）；金忠杰，博士，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银川 750021）；田文林，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殷之光，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排名不分先后。

**文章编号：**1673-5161(2023)05-0003-27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的中东研究路径探析

周 烈 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教授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不断践行,中国与中东各国加强深度交流合作,中国的中东研究也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指示并要求“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sup>①</sup>2017 年 5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提升国际话语权。

构建中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按照习总书记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国的中东研究也应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之路,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建设。在 2018 年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中东研究者有必要关注和思考“构建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这一现实问题。

### (一)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从旧文科到新文科的历史演进

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简称,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称。中国古代没有学科分类,只有个大概的统称“杂学”。汉代有“三教九流”之称:儒教、道教、佛教;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在认识到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不如西方文明后,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倡导以传统文化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据此,我们开始移植、照搬西方学科体系和先进科技,并以此形成旧文科。

第一次对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大规模移植是在“五四”前后。其间,日本成为中国人接触西方文明的窗口。西方的历史、制度、法律、科学、教育、启蒙思想甚至马克思主义,最早大都是通过日本人的译介而接触到的。在与西方交流的过程中,日本人感到使用原来采自中国的文言词汇在表达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困难。于是,一些日本学者利用传统的语文资源加以改造,制造出了汉语中原没有或虽有但意义不同的新词语来表达这些新事物。<sup>②</sup>后来,这些词语又经过中国留学生辗转进入中国的新语言里,使汉语萌发出了新的活力。

第二次大规模移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从院系设置、教学组织、课程设置到教学大纲都照搬苏联的蓝本。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大量概念中,有许多称谓和制

<sup>①</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 年 5 月 18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上网时间:2022 年 10 月 6 日。

<sup>②</sup> 黄荣彬:《日本人造汉语词对汉语的影响》,科学网,2017 年 8 月 22 日,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626289-1072200.html>,上网时间:2023 年 5 月 22 日。

度设计都来自苏联。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中国高等教育从宏观管理体制到微观教学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以大规模院系调整为切入点,形成部委举办高等教育的格局,直接对接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在中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上,建立了以学校—院系—专业—教研室的教學组织体系。在微观教学体系上,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都直接采用苏联蓝本。可以说,苏联教育模式奠定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今天,人们熟知的高校组织架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教学工作量制度、教学编制等众多最为基本的教学管理制度,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sup>①</sup>

改革开放之后,第三次大规模从西方移植社会科学开始启动,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有一段时间,甚至提倡在高校上述学科的建设中,尽量使用西方的原版教材。

综上所述,旧文科包括以下特点:内容上无中国特色;特别强调“分科治学”;过于强化学科自身的存在和建设,而轻于问题的解决。旧文科衡量学科最常用的标准首先是博士点或硕士点,其次是梯队配置,如正副教授多少,年龄结构是否合理,然后是承担了多少国家项目,还有就是权威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大家都大张旗鼓地搞学科建设,但学科存在的终极根据应该是为了解决问题。然而,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以西方特别是以欧美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主要是西方的,包括所有的研究范式、理论工具、方法路径、设计旨趣均是西方的,基本上是一种全盘性的横向移植。

正是基于此,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这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新文科,其主要特点包括: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追求学科融合,强调学科交叉,乃至产生新的文科门类;更加突出问题,更加强调以问题研究为中心。

新文科建设就是要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转型。这个本土化转型的本质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丰富、补充乃至部分修订被我们视为普适规则的若干经济学预设、政治学预设、法学预设。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就是要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sup>②</sup>可以说,是社会大变革呼唤新文科,提升国家软实力、培养创新型人才、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都需要新文科。就这样,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过程终于正式开启。新文科建设正式被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 (二) 西方理论模式下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移植自西方。这种移植,对中国传统学术而言,无疑是一场填补现代学术空白的深刻革命。没有这一引进就没有现代学术,其意义不容低估,但“言必称希腊”的弊端也相伴而来。<sup>③</sup> 这些学科本身尽管都是在中国语境下由中国人自己在研究,但同时也在按西方的话语模式进行,带有浓厚的西

① 邬大光:《大学人才培养须走出自己的路》,载《光明日报》2018年6月19日,第13版。

②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求是》2016年第9期,第7页。

③ 王学典:《何谓“新文科”?》,载《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第5版。

方色彩。甚至有人以仰视的视角看待西方的社会制度、产品技术、文化艺术、话语模式,乃至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近百年来,我们都是竭力在追逐西方,用西方模型、西方话语来表述和表达中国。学术圈对西方标准的迷信是不可否认的存在。

过去我们做研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别人跑,现在确实需要很好地思考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sup>①</sup>我们怎样才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成果,有自己的学术权威,有自己的话语权?这应是学术研究的新使命。

### (三) 中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路径探索

中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是一种需要广大学者共同参与的开放的型态,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因此,没有现成的方法,没有关于如何构建的标准答案。中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路径探索将是我们共同面临的责任和使命。

首先,要有构建中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意识和自觉。十八大之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同中国社会一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为延续了近 30 年之久的“西方化”发展取向得到坚决扼制。近若干年来,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中国社会的语境正在被重构,整个中国本身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奔跑。<sup>②</sup> 具体而言,中国的中东研究要从仰视范式向平视范式转变,要使借鉴成为选择性借鉴,要使单方面借鉴成为相互借鉴,不再依附于西方的中东研究话语体系,要主动设置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从出材料、出文献、出数据,出案例、出调研报告,向出理论、出思想、出概念、出话语、出方法转变,从实证向实证与思想并重转变。中国的中东研究也必须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其次,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和启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sup>③</sup>美西方以“国强必霸”的逻辑鼓吹“中国威胁论”,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文明的精髓是“和”文化,讲究“君子和而不同”“家和万事兴”“和

<sup>①</sup>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载《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sup>②</sup> 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载《中华读书报》2016 年 9 月 21 日,第 5 版。

<sup>③</sup>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载《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6 日,第 1 版。

衷共济”……“国强必霸”的逻辑并不成立。事实证明,西方的观念、西方的逻辑并非他们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和“绝对真理”。那只是基于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认知、他们的利益而得出的看法和结论。我们基于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自然有我们自己分析事物的逻辑和评价事物的标准。对于西方强加给我们的一些理论观点,一些贬压我们的不实之词,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我们的理念和观点予以驳斥,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和顺从。这为我们加快构建中东研究自主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做出了示范。

再次,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理论阐述为依托。习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该理念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将整个人类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而产生的安危与共、荣损相依、合作共赢、权责共担的总体意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这为世界各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超越差异分歧、实现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思想支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引领。<sup>①</sup>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这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异:西方国家长期秉持“以我为尊”“以我为主”的心态,在处理“我”与“他者”的关系上更强调竞争多于合作、对立多于统一。零和博弈、冷战思维、“脱钩断链”等思维和做法,正是造成当下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剧的重要根源。中国则倡导摒弃“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主张尊重文明个性,积极寻求文明共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这为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西方国家长期奉行“价值观优越”的逻辑,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西方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他们对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明不屑一顾,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充满了傲慢与偏见,并通过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中国则倡导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不搞意识形态对抗,扩大同其他国家利益的汇合点,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统一起来,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习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为我们构建中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为驳斥美西方“价值观优越”“以我为尊”“零和博弈”等思维和做法,提供了十分有力的理论依据和学理支撑。

最后,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随着认识范式的转变,专业视野、研究方法和目标都将改变。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构建自主的中东

<sup>①</sup> 高祖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意蕴和重大价值》,载《人民日报》2023年5月22日,第9版。

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

第一,积极推进多学科整体性研究。区域国别的研究对象有别于任何一个现有学科,是对区域国别进行整体性、宏观性、系统性的研究,因此中东研究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的参与,需要研究者有跨学科、多学科的知识积累;需要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地理学、安全学等不同学科方法,对中东地区及国家进行系统性研究,从而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知识领域。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无法被简单归于纯粹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几乎所有方法都有可能被应用其中。目前,中国的中东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需要发扬并提升既有的人文学科优势,加强社会科学方法在教学和研究中的运用,实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有机结合,实现中东研究的健康发展。

第二,积极推进多形式合作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学科特征使得任何学者个人,都不可能掌握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或国家的所有相关知识。因此,中国的中东研究需要有许多团队,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中东研究的合力。一方面,需要研究同一对象国或对象地区,但分属不同学科的学者相互协调合作;另一方面,需要同一学科背景,但研究不同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学者相互协调合作。<sup>①</sup>要积极倡导推进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研究,在联合举办会议,共同进行研讨的基础上,开展实质性研究中的合作。在不断深入理解中东地区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的基础上,将中东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情况纳入比较研究范围,充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拓展中东研究的视野,在新的起点上创新中国中东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积极推进多层次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中东研究不仅要有深度,还要有战略高度。学科的设置和建构本来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sup>②</sup>中东研究的重点要放在探索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放在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理论和学科体系构建上。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辩证关系,实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互促进,实现中东研究的平衡发展。高质量的中东研究要求同时具备理论性和地方实际性。无论是静态研究还是动态研究都要结合地方,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中东地区复杂多样的客观现实为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题材以及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如历史与现实、世俗与宗教、民族与国家、部落与政府、和平稳定、地区冲突、国家治理、发展道路、经济转型、秩序重构等。要研究这些问题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对外关系、国际地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我们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提炼有学理性的新发展与合作理论,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向政策性、战略性转化,充分发挥建言咨政功能。

第四,积极推进知识结构多元化的中东研究队伍建设。中东研究需要培养复合型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需要塑造一批“国别通”和“领域通”的中东专家;

<sup>①</sup> 王缉思:《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网,2018年12月21日, <http://www.iiss.pku.edu.cn/research/bulletin/3480.html>, 上网时间:2022年11月7日。

<sup>②</sup> 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

需要深入开展学术交流,推进国际合作研究,拓展双向学术传播渠道,逐步形成具有中国学者视角的研究范式,构建具有中国学者特色的中东研究知识体系,产出具有中国学者特点和重要标识的原创性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中东研究的中国学派,全面提升中国中东研究水平,提升中国中东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第五,中国的中东研究需要有多维的研究视角:一是历史的视角,现实中发生或存在的问题,往往与历史联系密切;二是文化的视角,民族精神、宗教习俗对于今天中东各国的政治生活以及地区一体化进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三是全球或地区的视角,各地区发生的问题一般都不会是孤立的,一定和全球或地区格局的变化以及全球或地区政治的转型有内在关联;四是比较的视角,不做比较研究,很难写出有深度的研究论文;五是中国政治的视角,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中国学者从事中东研究既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需要,也要服务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sup>①</sup>相关工作让学术研究成果惠及决策者,惠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全体社会成员,提高中国社会理性化的程度,让现代中国不断走向成熟。

第六,如何应对西方的概念、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sup>②</sup>在倡导构建中东研究自主话语体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在“闭关锁国”中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不能在“自言自语”中完成,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范式的构建,也不能关起门来进行。“西方中心主义”固然必须抛弃,“华夏中心主义”尤不可取。必须在与西方学术的碰撞交流中,汲取他人的精华,才能最后走向世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提出对西方概念、理论的五级应对法:一是接受+辩护;二是扩大概念内涵;三是加定语;四是对既有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五是提出新概念。<sup>③</sup>

我们主张构建中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主张认知范式的转变,不是彻底排斥西方的概念,不是回到中国的古代,而是基于现实的今天的中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鉴于范式是学术共同体的一致共识,不是一个人的观点和方法,因此,认知范式的变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探讨构建中东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也不可能一下子推出一整套的中国范式,这里的关键是立场问题,是学者的自觉,更是学者的主体性。

① 李晨阳:《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多维视角》,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22期,第69页。

②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中国政府网,2021年6月1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lsRedirectHit=20481191](https://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lsRedirectHit=20481191), 上网时间:2023年5月22日。

③ 范勇鹏:《如何克服西方概念的消极影响》,环球网,2023年3月8日, <https://3w.huanqiu.com/a/de583b/4BzG8d9qQtH>, 上网时间:2023年5月22日。

##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 ——兼谈中东研究的几个案例

答 涛 博士,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教授

在世界历史进入到“百年未有大变局”的背景下,在主权国家仍然是而且还将长期是世界舞台上最重要角色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追求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极具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这也提醒我们去深入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本质性特征。

### (一)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本质性特征

近年来,我们国家高层多次强调要努力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可见,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小事,可能也不只是学术界自身的事情。客观来讲,哲学社会科学确实具有两面性:一是科学性,二是政治性。科学性指的是按照学术规范和学术规律来发展并评价它的优劣短长;政治性包括时代性、民族性、语言载体、文化继承、意识形态功能等元素。那么,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显然就需要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不可偏废。既不以科学性否定实践中客观存在的政治性,也不以政治性抹杀科学性。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要立足于现代中国曲折而生动的实践,又要和中国历史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并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发展指出了方向,那就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sup>①</sup>。

中国的实践一般被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它强调两个“结合”: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的前提性规定,而这一提炼有一个从自在自为到自觉的过程。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哲学体系以及理论体系,大部分都是自近代以来从国外尤其是西方引进的,是中国曾处在贫穷落后、学术和思想不发达情况下一种迫不得已的境遇。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当前已经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那就是要为中国“做法”构建一套既能自圆其说、又与普遍的知识系统相容的“说法”。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

2022年底,“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之下的一个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策领域都在热烈讨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之

<sup>①</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际,我们首先需要从根本上认识到,区域国别学内在地同样需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首要的问题意识就是不再单纯以西方为方法考察自身与他者。

## (二)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使命与理论任务

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国历史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

区域国别学的定位是与研究境外或国外有关的学科与学问,这一学科天然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从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的角度研究和分析这一关系。研究外国,可以是纯粹的学术兴趣,但作为中国人,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中国自身,进而理解和表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当代中国学者来说,尤其需要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深度思考中国与全球化、中国与新的世界秩序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成长给世界体系带来的新变化。还需要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框架内,思考和探究如何构建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问题。

以世界的或全球的眼光来思考中国,涉及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那就是既认清世界形势,又“讲好中国故事”。区域国别学以研究外国为己任,但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从国外已有的经验来看,区域研究同时肩负着沟通内外和传播自己声音的使命。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就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理论的重要前提,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新政治—经济学”,它不同于西方的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旧政治—经济学,尤其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根本不同。

即便是从旧的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来看,对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的解釋路径也是多样化的。英国学者约翰·格雷曾指出,自由资本主义不是普世的,而是一种特殊现象,最终他趋向于多元现代性的观点:“经济现代化并没有在全世界复制出美国自由市场体制而是与自由市场背道而驰。其孵化出本土型的资本主义中可以归功于西方模式的东西很少。东亚市场经济之间有深刻的差异,它们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的不同类型。但所有这些新型的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并不与任何西方模式趋同。”<sup>①</sup>

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内表现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以精准扶贫为方式,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对外表现为坚持开放,支持全球化,并团结一切自近代以来被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和剥削的国家与人民,追求建立以公平和正义为基本原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尤其关注全球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共同的苦难历史经历使中国更容易理解和平等地看待亚非拉地区的“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取向既反映了当代中国关于良善世界秩序的主张,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理论灵魂和关注重心,否则,新兴的区域国别学和西方已有的区域研究能有什么不同呢?

随着中国的成长和世界迎来“百年未有大变局”,国家间的内政与外交之间

<sup>①</sup> [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刘继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这是由中国的体量及其世界地位决定的。中国日益成为弥平内外的大国,也就是说,很多政策与问题越来越不再有明确的内和外之分。其实,内部的东西往往也是外部的,比如“精准扶贫”其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追求普遍正义的表现,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的所谓经济规律,更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或主张。一国政府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是一个“至大无外”的问题。遗憾的是,学界还没有将基于中国实践的诸多做法和命题作为一个严肃的社会科学问题进行学术化处理,更没有将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式或认识论,而更多是仅仅视之为政治或宣传。当然,这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中国也是一个“被启发”的国家,这在近些年的中美关系中表现尤为突出。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创造了独特的传统和路径。今日之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历史之中国的延续,知古、鉴古可以照亮当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关注和研究外国,但立足点毕竟在中国,因而需要结合中国的历史与优秀文化传统。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往复关照自我与他者,首先是将世界“中国化”,进而将中国“世界化”。当前,了解世界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种理解对中国人来说,离开中国自身的传统,离开以中国为方法,就很难“接地气”,但同时也要注意克服“中国中心主义”带来的遮蔽。

有人曾将西方的传统概括为一个“分”字,不只是劳动分工或分科治学,也有政治上的分权制,或在国家领土的意义上,欧洲分裂为小国林立。而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大一统”。以前,人们更多地是将欧洲视为标准,通过欧洲“分”的视角来分析和看待中国与世界。那么,现在中国能否成为一种标准或方法呢?以中国为方法,至少可以平衡一下一家独大的西方标准,就像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提的“作为方法的中国”那样。<sup>①</sup>沿着上述思路,“大一统”或“天下”<sup>②</sup>能否被作为一种标准来讲述外国历史或世界史?

这不是说要以中国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而是倡导方法或视角的多元化,这或可带来方法论上的自由。笔者曾尝试以某种“大一统”史观讨论奥斯曼帝国史,以抗衡“东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谋。<sup>③</sup>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次级传统表述可以借用,比如“因俗而治”。笔者曾经在讨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所谓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sup>④</sup>时,尝试将其与中国历史上的“因俗而治”进行类比,<sup>⑤</sup>从而避免像英语学界那样只是进行音译,或不恰切地使用作为现代政治术语的“自治”。用“因俗而治”这样的传统中国历史术语来解释奥斯曼帝国历史,对中国学者来说,是不是更为“接地气”呢?

复旦大学哲学教授丁耘曾指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成,离不开标识性

① [日本]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25-133 页。

②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笕涛:《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92-95 页。

④ 传统上,米勒特制度一般指根据宗教或教派的不同,对奥斯曼帝国境的不同宗教的信众实行某种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多元化统治与治理的方式。

⑤ 笕涛:《“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载钟焯主编:《新史学》第 13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89-224 页。

的学术概念。具有解释力、原创性、逻辑性和生命力的学术概念,无不是在本土历史文化过程及政治实践中抽象而出,又能进入学术流通,为外人所用。传统中国形成有别于西方的自成一体的知识体系,一些概念一直使用至今;当代中国丰厚的社会政治实践同样产生诸多影响广泛的概念,其古今中外兼收并蓄,逻辑关系相互支撑,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sup>①</sup>这种洞见其实指的就是如何以中国为方法来认识和表述世界。

### (三) 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

在明确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使命与理论任务之后,就存在一个如何做与怎么办的问题。

首先理论教材的建设任务非常紧迫。近年来,一些与区域国别学有关的“教材”迅速面世,但遗憾的是,还没有一部专门论述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教材。其中的原因大概除了时间比较紧之外,更重要的是尚未能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追求纳入视野。为了完成前述的理论构建,需要深入研究传统所谓“轴心文明”的世界观与秩序观,包括儒家文明、古希腊文明、两河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研究这些古典文明体系所产生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它们对不同文明区域内重要国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持久影响。

其次,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需要研究已有的重要的区域国别学学术传统,包括欧洲的东方学(如汉学、突厥学、印度学等),美国的区域研究(经典现代化范式、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及后现代与建构主义范式指导下的区域研究),日本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国研究、满鲜研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关系),俄国—苏联传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野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近代中国的区域与国别认知(建立在译介基础上的世界认知)、中国共产党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从延安时代到改革开放前),以及世界革命、解放与亚非团结视野下的政治认知等。

最后,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呼唤自主的学术评价体系,避免为他人背书,避免被他人的标准所绑架,这就需要一种真诚且理智的自信,需要在突出自身主体性意识的前提下,客观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既然追求“中国特色”,自然需要建立在学术自信基础上的评价标准。在不久前,学术评价一度日益挟洋自重、盲目崇洋,其对学界之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就区域国别学来说,要回到正轨,就需要在坚持学术标准的前提下“破五唯”,鼓励以中国为方法研究世界,以能够有效地回应中国关切为旨归,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评价相关学术成果与创新。再以中东研究为例,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与时代命题,自然会引导我们去研究中东各国伊斯兰文化的独特性和本土化路径。在笔者的建议之下,《中国穆斯林》杂志已经做出了有益尝试。

总之,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国家与时代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应成为广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灵感源泉,这也是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时需要着重汲取的。为此,既要知己,也要知彼。所

<sup>①</sup> 丁耘:《论中国哲学的标识性概念》,网易新闻,2023年1月31日, <https://m.163.com/dy/article/HSE3FQ0E0541MRHS.html>, 上网时间:2023年8月26日。

谓知己,就是要从中国的历史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提炼概念,使之学术化、理论化,因而必须要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深入研究中国的秩序观、天下观与世界观。所谓知彼,就是要研究世界历史上其他文明、其他传统和其他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史、思想史与学科史,以及相关知识生产与某国的国家利益及历史性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立足于脚下这片土地,立足于这片土地上的实践,进行博古通今的研究,中国的新一代学者应可以创造出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工作者的优势和潜能。

## 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三个紧密结合

金忠杰 博士,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下,根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总体部署,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界紧扣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外交合作需求,通过东西南北中各级各类专门的人才培养机构与研究平台,一代接一代地致力于中国中东研究学科建设,构建了包括中东语言在内的本硕博完整的学历教育体制机制,<sup>①</sup>代不乏人地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语言翻译人才、外交外事人才、学术研究人才、媒体与国际传播人才、商业贸易人才等各类专门人才,形成了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体系格局。从历史与现实、纵向与横向围绕中东区域整体与国别个体的历史现实、区域情状、国家概况、政治外交、经济贸易、能源资源、工业产业、安全军事、社会文化、法律法规、民族宗教、部落家族等研究领域,<sup>②</sup>推出丰硕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成果,有效保障着服务党和国家对中东国家合作交流的知识需要与智力支持。<sup>③</sup>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界同仁,根据中国外交“大国关系”与“周边关系”的总体外交战略部署,更是通过各级各类组织化、机构化、机制化、团队化、平台化、规模化、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主持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与国别区域研究项目等在内的各级各类项目,涌现出多元化、类型化、专题化、领域化、专业化、前瞻化、时代化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术成果。<sup>④</sup>既有力推动着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与学术成果取得了显著效果,为中国中东外交全面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sup>⑤</sup>也在国际中东研究学界展现了具有中

① 朱威烈:《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阿拉伯语学科建设 30 年回眸》,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 年第 5 期,第 3-10 页。

② 孙德刚:《中国的中东研究:1949-2010 年》,载《西亚非洲》2011 年第 4 期,第 64-72 页。

③ 成红:《中国的中东文献研究综述:1949-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 页。

④ 蒲瑶、李甜:《21 世纪以来中国中东研究述评(2002-2016)》,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82-104 页。

⑤ 王林聪、王海媚:《21 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东研究:现状与前景》,载《国际政治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40-160 页。

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特色的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派——中国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哲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语言学等跨学科学界经过长期积累,形成了综合性与总和性、领域化与专业化、专门化与学术化的学术称谓。这是中国中东学界专门领域人才对古往今来关涉中东区域国别自然、社会、人文等领域历史、现实、术语、概念、范畴、知识、思想、方法的研究活动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它立足于中国中东合作交流的现实需求,关照中国中东的未来发展,在特定时空维度上,以中东区域国别为空间区域,以博古通今与未来关怀为时间进度,以探究中东区域国别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外交、工业产业、商业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宗教、部落家族等发展问题为对象,构建了集区域、国别、领域、专题、方向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另一方面,它在关涉中东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领域,讲求中国主体性、话语引领性、语言基础性、学科多样性、学理建构性、自主知识性、研究系统性、理论专业性、方法多元性、路径创新性、区域整体性、国家个案性,形成具有中国新时代自主知识特色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因此,建构新时代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的内涵更加丰富。它结合三个重要文件政策的理论基础、学科基础、人才基础,开启中国中东区域国别新的学科征程,走向新的发展辉煌,取得新的学术成果,获得新的研究业绩,做出新的时代贡献。

#### (一) 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外交定位与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十四部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未来中国外交所作的总体布局,从中国外交研究所要的服务需求角度,成为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和工作要求;第五部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sup>①</sup>明确要求“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sup>②</sup>……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sup>③</sup>从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所需的学科建构与内涵的丰富来讲,则是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的政策来源基础、理论创新基础、实践应用基础、学科建设基础和自主知识基础。

新时代中国中东外交战略与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相辅相成性质,促使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内涵深化,既是中国中东学界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外交战略部署的工作答卷,也是推动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步伐。它必然要围绕中国外交和科教兴国战略的自主体系展开,自主基调的关键则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形成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自主选择、自主建设、自主主张、自主把握、自主调整、自主辨析、自主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页。

<sup>②</sup> 同上,第43页。

<sup>③</sup> 同上,第34页。

创新、自主范畴、自主学科、自主知识、自主适应、自主管理等。概言之,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内涵的丰富,是中国外交与中国科教兴国战略自主建设的自主性体现。

## (二) 紧密结合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基础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讲到了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四个战略性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这篇富有哲学意义的集思想、理论、指导、实践于一体的重要论述,回答了为何构建、如何构建、如何行动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重大问题,要求把握好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并且“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sup>①</sup>尤其“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sup>②</sup>因此,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具有交叉性质的新型学科,当然也属于上述支撑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直接学科或间接学科范畴,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性,首先体现在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三大体系”的自主性方面。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四个战略性问题,以及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sup>③</sup>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界需要进一步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进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基于座谈会重要论述与二十大报告“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的战略定位,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具有“基础、新兴与交叉”的三重属性,促使中国中东区域国别学科按照“中国事务→中国外交→中国学科→中国学术→中国话语→中国知识”的自主逻辑,坚持以“三大体系”为理论基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提升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在世界中东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话语原创权,一代人下大力气培养出一批“出思路、出概念、出术语、出数据、出案例、出观点、出

<sup>①</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6 年 5 月 18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上网时间:2023 年 8 月 12 日。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2 年 4 月 25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7105.htm](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7105.htm), 上网时间:2023 年 8 月 12 日。

方法、出思想、出理论、出成果”的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队伍,紧紧围绕中国中东外交事务,开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思想,提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理论,研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理,发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观点,创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成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品牌。充分体现新时代新征程上具有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立场、精神、方案、智慧的中国中东区域国别学科“三大体系”的自主构建,着力在学科定义、学科定位、学科平台、学科队伍、学科研究、学科管理上,形成自主体系的自主学科集成优势,继而通过自主研发“三大体系”所需的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理论体系→自主方法体系→自主教材体系→自主知识体系→自主研究体系等,培育和涵养中国中东区域国别自主知识型人才队伍,产出具有中国中东区域国别学派特色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整体性、时代性、长期性服务于中国中东外交工作新需求,丰富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格局和新内涵。

### (三) 紧密结合中央人才工作战略的重要基础

构建中国中东研究人才队伍的自主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题中要义。中央人才工作会议要求“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指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务要全方位地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sup>①</sup>

根据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结合二十大报告“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人才定位,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交叉性质与研究人才队伍的自主建设,决定了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队伍既是中国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中东外交与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时代之需。

第一,培养造就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的“大先生”,成为新时代中国“培养造就大批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的时代必然。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交叉性质,决定了构建和丰富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人才队伍,需要中国中东合作宏观上“政产学研用”之间的相辅相成。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到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尤其是二十大报告关于人才队伍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都充分说明和定位了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队伍,在中国中东合作“政产学研用”工作构成中关键要素形成的集成性作用和专业性优势——各有特点、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相互促进、彼此支撑、同步作用,高瞻远瞩地构建中国中东外交研究所需的自主人才主力军与久久为功的智慧生力军。

在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三大体系”构建视域内,中国自主培养自主知识

<sup>①</sup> 《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1年9月28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8/content\\_5639868.htm](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8/content_5639868.htm),上网时间:2023年8月12日。

型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队伍的工作重点,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中东外交为观照,立足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外交战略实际、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以及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时代命题。结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当代国际关系变化之变、当代中东区域变化之变,不断推动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队伍的自主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及时发挥学术研究的学理作用、理论作用、助研作用,力争做中国中东外交合作交流战略的好帮手、好助手、好参谋,从而能就中国中东合作事务,适时与适事地研得准、把得住、理得出、讲得清、说得透、对得中、答得上、拿得出、用得到、叫得响、有效果、起作用,常态化服务中国中东外交的全方位合作。

第二,根据二十大报告“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的人才要求,<sup>①</sup>中国中东外交人才与中国中东研究人才的整体逻辑与递进关系,鲜明地点出构建与丰富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中东外交上具有“工作时的‘大师作用’”,在中国中东全面合作上具有“需要时的战略作用”,决定了这支队伍必须要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外交的时代精神。发扬中国学科“三大体系”的自主特色,在新时代中国中东外交发展的历史方位中,通过多学科与跨学科的交叉学科理论与方法,整体性、宏观性、微观性、时代性、系统性的中东与世界中东研究,真正造就一批自主知识型的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队伍。与时俱进地总结经验、创新理论与更新话语,深入研究中国中东外交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具有中国学者视角的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体系。紧密结合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知造”与“中国智造”上相结合的自主知识体系,产出具有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特点和重要标识的自主原创性系列成果,高质量地为服务中国中东外交工作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持和必要的智力保障,最终形成能够“走进”世界一流的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派。这也正是贯彻落实二十大报告与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人才定位与精神,对培养中国中东研究“领域通大师”与“国别通大先生”提交的时代答卷。

当前,随着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必将把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体系推向更加自主的学科化、体系化、知识化、专业化、质量化。中国中东学界也将结合上述三个重要基础,紧紧围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沿理论与方法,将中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团队、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特色智库、外交服务”的学科集群推向新的自主知识体系发展高度。同时,必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地立足中国话语、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学术精神,高质量地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方位开展,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长期性与常态化地贡献新时代中国自主的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体系的智慧与力量。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36 页。

##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避免西方认知的误区

田文林,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当前,建构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在这方面,区域国别学虽然成为一级学科历史最为短暂,但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同样任重道远。

### (一) 建构区域国别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迫在眉睫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话题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首先与中国当前面临的时代任务有关。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趋提升,我们已经初步解决了因军事落后导致的“挨打”问题,也基本解决了经济落后导致的“挨饿”问题,但中国至今仍面临因国际话语权不足导致的“挨骂”问题。之所以出现“挨骂”问题,直接原因是中国至今仍缺乏足够的国际话语权,而要想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除了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丰富传播手段之外,最重要一点则是建构逻辑自洽的自主知识体系。没有强有力的自主知识体系做支撑,提升国际话语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进一步看,要想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需要破立结合,既要对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尤其是西方文化霸权塑造下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又要结合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相应的理论建构和知识体系创新。

作为从事中东问题研究的区域国别学者,之所以也要参与探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宏大话题,最直接原因就是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成为一级学科。随着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地位提升,如何建设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也相应提上日程。通常来说,区域国别研究更多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消费者,而不是相关理论的生产者。在过去相当长时期,中国的中东问题研究(也包括其他区域国别研究)更多是被动采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和方法,由此实现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化”。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现成的理论和方法很多都是“西方制造”的知识产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当前,在中国已经将区域国别学确立为新的一级学科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包括中东研究)水平能否再上新台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指引。毋庸讳言,如果我们继续沿用过去做法,不加批判地照搬其他学科的现有理论和知识体系,未来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大概率将会是低质量徘徊、低水平重复。就此而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显得迫在眉睫。要想提升区域国别研究水平,区域国别研究者必须增强学科意识,强化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

同时,区域国别研究自身特有的强烈政治属性,也决定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会科学本就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布迪厄认为,社会研究都是在特定的场域中开展的实践活动,资本、权力等政治因素每时每刻都存在,不明确认识到社会研究中的政治因素和政治功能,就无法正确地开展社会

研究活动,也无法保证社会科学的存在。<sup>①</sup> 缪尔达尔和西林在深入探究这个问题后得出结论:在研究工作中有六个阶段受到价值观判断的影响,但不一定使研究结果有偏颇。在问题选择和概念形成这头两个阶段,价值观决定是显著的,但并不总是使研究工作发生偏颇。价值观判断影响到数据选择、解释说明和理论构建诸阶段时可以导致偏颇。<sup>②</sup>

与前者相比,区域国别研究的政治属性更加明显。从学科起源看,当年西方国家开始从事区域国别研究,出发点就是西方国家为了更好地进行对外扩张,需要对非西方世界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动向加深了解。欧洲列强早期的东方学研究,以及 20 世纪演化而来的区域研究,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最终服务于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扩张。萨义德就专门区分了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他认为,关于莎士比亚或华兹华斯的知识是非政治性的知识,而关于当代中国和苏联的知识,则是政治性知识。说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人文学者或一个专门负责济慈的编辑不涉及任何政治的东西的一个原因是,他所制作的似乎是对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现实没有直接的政治效果,而一位研究苏联经济的学者所从事的领域,则充满剑拔弩张的气氛,涉及到政治利益,他研究的结果和提出的建议会被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体制经济学家和情报专家所采纳。<sup>③</sup>

当前,中国大力倡导和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同样是为了适应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需要。因此,它同样要明确“为了谁、服务谁”的政治立场问题。鉴于欧美国家有关区域国别的现有研究成果和知识体系,本质上都是为西方国家利益服务,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由此决定了中国要想推动区域国别研究水平,不可能简单照搬西方区域国别知识成果和价值标准,而必须对其现行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

## (二) 提升区域国别研究水平离不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随着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如何提升区域国别研究水平便提上议程。许多人认为,欧美国家从事区域国别研究起步早,积累深,其研究水平自然更高,成果更具学术价值。这一判断表面看没什么问题,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西方国家主流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仍存在不少缺陷,中国提升区域国别研究水平,必须增强理论自觉,通过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避免陷入西方现有区域国别研究的误区和认知陷阱。

第一,政治立场差异必然导致认知角度差异。欧美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出发点是服务于西方国家霸权扩张目标,这一特征体现到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就是西方主流区域国别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在它们的研究体系和整体观点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国家视为整个世界的中心,是人类社会先进和文明的主要代表,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则被视为是野蛮和落后地区,并由此得出结论:世界其他国家应该仿效西方国家的模式、道路和制度,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和全面转型。在现有西方区域国家研究成果中,持此类观点的著作不

<sup>①</sup> 李明:《试评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载《发展》2009 年第 10 期,第 77 页。

<sup>②</sup> [美] 罗纳德·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高钰、潘世强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sup>③</sup>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2-13 页。

胜枚举。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东方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当前中国的发展繁荣则来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此,无论从感情还是理智上,中国都不可能接受这种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而需要在弘扬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

此外,西方国家从事区域国别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维护西方大国的霸权利益,并最终建立等级性的帝国体系。这一目标决定了其倡导的很多基本原则和方法,都带有很强的霸权主义和弱肉强食色彩。如分而治之、势力范围、权力真空、代理人等概念和原则,都是构建等级性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在西方的区域国别话语体系中,安全可以离开发展等其他要素单独存在,而追求“绝对安全”则最终会导致“安全两难”问题。在这方面,中国作为饱受霸权主义欺凌的第三世界国家,其看待世界更多是立足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国官方的基本主张是支持世界多极化,建立去等级化的水平状权力格局。近年来,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等,以及将发展与安全有机结合、以发展促安全等一系列政策主张,都与西方主流的区域国别研究观点大相径庭。中国进行区域国别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侵略和征服他国,而是相互增进了解,更好地实现经济互利合作和民心相通,乃至最终目标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很难在西方的区域国别知识大厦基础上建构我们的体系,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另起炉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

第二,东西方在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异。总体看,西方国家的主流区域国别研究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论色彩。西方国家早期的区域国别研究以人文科学为主;进入20世纪后,随着美国成为区域国别研究重镇,研究方法也逐渐从人文科学方法为主转向社会科学方法为主。<sup>①</sup>这种方法论转向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随着西方科技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方法论“自然科学化”的不良倾向,这种方法论思潮的典型代表就是行为主义/科学主义。这种新的方法论思潮强调量化统计和实证研究,主张效仿乃至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然而,且不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巨大差异。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更不用说量化统计方法),其哲学观是一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形而上学思维。这种方法执着于事物的表象联系,倾向于从孤立、静止、片面的角度看问题。因此,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和整体,也认识不到事物不断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变化趋势。从二元对立思维出发,看待事物必然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体现在政策分析过程中,就是将所有矛盾等同于对抗性矛盾,进而将国家间对抗常态化、常规化。在这种形而上学思维的引导下,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零和思维盛行,而零和博弈引导下的国际关系多以冲突性政策为主。另外,在国际观方面,西方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立足于“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体系,往往是“以国家观世界”,由此衍生出为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无惧整个世界洪水滔天的极端自私想法和做法。事实

① 李强:《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5期,第155页。

表明,西方国家正是本国本位出发构建世界,由此导致世界发展日趋重大失衡。

这种方法论领域的偏差和缺陷造成的最终结果,就是西方区域国别研究成果表面看硕果累累、博大精深,实则存在不少谬误和认知偏差。如许多国内学者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中东研究水平代表着世界一流水平,甚至个别中国知名中东研究学者也言必称美国和以色列,声称世界上最好的中东学者都在美国和以色列。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如果美国的中东研究水平真的非常高,为何 21 世纪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遭遇巨大挫折?有人会说,这是因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决策与美国的中东研究脱节所致。事实上,小布什政府恰恰是听从了某些美国中东研究学者的观点和建议,才推出了“武力输出民主”和“反恐战争”的中东战略,而恰恰是这些昏招,最终导致美国在中东严重受挫,国力由盛转衰。这个案例当然不是说美国的中东研究一无是处,但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受到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影响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其成果尚未达到让中国学者顶礼膜拜的程度。

相比之下,中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主流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中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的区域国别方法论实际是“以世界观世界”的天下主义和共同体思想,将区域国别置于世界整体的视角下进行考察,把国家当成整体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区域国别研究)更多从发展变化的角度看问题,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置于发展变化过程中进行考察。此外,在历史观方面,中国倡导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此而言,中国学者承认文明间存在差异,但这种文明差异并不是导致国家间冲突的决定因素,更不会赞同“文明的冲突”这种历史唯心论十足的观点。

第三,政治立场和方法论差异,决定了东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议题也不尽相同。西方国家从“西方中心论”出发,很自然地将西方国家的制度、道路、模式视为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照搬的普世性模式。不难发现,西方区域国别学者往往热衷于讨论民主化、现代化等带有东西比较性质的议题。在西方国家的主流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中,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就是对象国到底是不是“民主国家”以及如何“民主转型”等问题,与之相关的次级话题则是诸如政治参与、市民社会、大众选举、程序合法性等话题。那些被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的国家,则被冠以“威权国家”“极权国家”等种种污名化称号。

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现代化叙事。现代化理论本身就是冷战的产物。它是冷战时期美国为了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一种带有地缘政治塑造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种现代化理论假定,西方国家的现状就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后的最终目标。罗斯托、李普塞特等众多“冷战知识分子”有意创造并强化了“现代化”理论,目的就是引导发展中国家以西方为模本的发展道路,最终将其嵌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以“经济成长阶段理论”闻名的罗斯托公开表示,现代化将取代殖民主义,它会创造“自由世界的被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一种新的后殖民主义的关系”。<sup>①</sup>

<sup>①</sup> [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 页。

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进程分解为若干指标,诸如政治现代化(多元民主、政治参与、政党选举等)、经济现代化(经济发展、营商环境、消费主义等)、文化现代化(包括世俗化、个人主义等)等等,而这些所谓“现代化”的目标主要是将西方国家的特殊国情神圣化、理论化的结果。现代化理论暗示,发展中国家只要实行上述变革,就能最终跻身“现代化国家”行列。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按照现代化理论实现了现代化。相反,许多发展国家按照现代化理论去强行推进本国全面转型,最终却导致传统与现代的严重撕裂,最后导致政局动荡乃至政权更替。197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垮台就是典型案例。换个角度看,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议题,本身就带有议程设置的政治含义,而且这些议题本身的科学性值得商榷。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倡导研究的议题,应该与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议题进行明显的区分。相比于西方国家主流区域国别研究强调的意识形态标准、程序标准、过程导向,中国更喜欢强调实践标准和结果导向。在中国学者看来,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和国家治理好坏,其标准不是抽象的理论性指标,更不是以西方国家为尺度,而是实践标准,即看这种制度或政策对对象国政局稳定、民生改善、社会进步、国家统一或国家繁荣,到底产生正向作用还是负面作用。基于这种实践标准,中国倡导研究的重点议题,更多是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遭遇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包括制度绩效、国家能力、工业化程度、经济规模、财富分配、地区整合状况等等。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提升治国理政水平,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 (三)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避免两大误区和陷阱

第一,要避免从反对“西方中心论”转向倡导“中国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把西方模式和西方经验绝对化、普世化,由此犯了将特殊性等同于一般性的错误。在现实中,西方国家鼓吹“西方中心论”,无形中使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留下了傲慢自大的负面形象。更糟糕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国家经验和做法,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准橘成枳、水土不服等种种困境。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是一种自主探索出来的有效发展道路,该道路既吸收了其他国家实现发展的共性规律,同时又保留了中国特殊国情形成的独特成分,是特殊性与一般性有机结合的产物。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遵循的方法论(特殊性与一般性有机结合)具有普世性,但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则不具有普世性——它适合中国自身,但未必适合世界其他国家。基于此,中国学者在建构区域国别的自主知识体系时,不应一面批判“西方中心论”,一面又将中国的模式、道路、制度绝对化,强行推销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从理论角度看,我们不能一边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论,同时又创造出一种新的普世价值论。

第二,批判地吸收西方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的有益成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相对起步晚,积累弱,我们若想提升区域国别研究水平,必须多向西方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同行学习,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的有益成分。总体看,欧美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固然有意识形态成分,以及基于方法论缺陷的认知误区,但我们也应看到,西方国家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积累深厚,许多材料和观点值得大力借鉴。换句话说,我们对待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

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唯有这样,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水平才能更上层楼,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 时空维度下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 ——一个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初步思考

殷之光,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国学界重又兴起了对“区域研究”的浓厚兴趣。在研究对象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将眼光投向了西方之外。这一思想动向,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专注欧美“发达国家”潮流的一次革命,且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局面急剧变迁所构成的新时代形势密不可分。虽然,这场巨大的知识革命仍在萌芽期,但这的确已经从客观上迫使我们不得不将原有局限于“西方”的“世界”观念,扩展到包含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地理全球。

这种真正意义上地理全球的再现,督促我们重新思考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即自己原先赖以认识和分析“世界”的诸种理论工具是否真正具有普遍性?当下,由问题意识驱动的“区域研究”只有透过对普遍性的追问,才能开始与更广泛的国际关系、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以及哲学、文学与历史的思考及研究产生最深层的联系,才能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需求产生联系。

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追求出发,我们方能进一步思考什么是中国的区域研究?这一问题包含了两个层面的认识论追问。首先,如何理解这个问题里的“中国”?一个学科、一种知识的“中国性”如何体现?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将中国视为一种政治与文化疆域的范畴。那么,接下来就需要问,是否在中国生产的,以中文或中国各民族语言写作的“区域研究”就天然地具有中国性呢?相应地,我们还能追问,那些由中国人或者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以其他语言写作的研究是否能被认为是一种“中国的”区域研究呢?其次,在这个问题中,“区域研究”究竟包含了什么学科性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另外,为其加上“中国的”这一限定性的修辞,是否损害了其作为学科的“客观公正”与“普世性”呢?

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如下这个前提开始,即:作为一种在时间与空间中存在的生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抽象思考,对自我的认识,都无法脱离这两个维度而独立存在。我们对于区域的思考也以这两个维度为起点。作为空间维度的“区域”为我们理解自己在空间中的相对位置提供了坐标。这也恰恰是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探索中,“以中国为观照”的理论意义之一。<sup>①</sup>

### (一) 对区域国别的研究应同时引入时空两个维度

基于空间相对关系进行的抽象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即“世界”、“全

<sup>①</sup> 习近平:《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求是网,2022年4月25日,[http://www.qstheory.cn/zhuanku/2022-04/25/c\\_1128595762.htm](http://www.qstheory.cn/zhuanku/2022-04/25/c_1128595762.htm),上网时间:2023年7月24日。

球”、“国内”、“国外”、“中国”,或是诸如“中东”、“非洲”等表示地理空间的名词是抽离历史的、绝对的、相互无关的。突破这种错觉需要为我们对区域的思考添加一个时间维度。将中国在时间维度上展开后,我们就能发现这一概念在长时段中的变迁及其内在延续性。这种变迁可以被理解为空间秩序观的不断变革。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国家”的建立,便指向了这种空间秩序观的根本转变。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的批评,便强调了在一个空间秩序中,将无边界的、含混的、普遍性的“天下”,转化为一个相对界限分明的“国家”。只有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之后,“国内”与“国外”、“中国”与“世界”的分野才产生了认识论的意义。

这里所强调的“转变”,便是添加了时间维度之后,空间产生的秩序性意义。添加时间尺度的作用在于,它一方面,能帮助观察者发现其赖以理解世界的许多工具性概念背后的局限。另一方面,也为空间之间的比较研究引入了长时段的视野,更好地让观察者认识到自身主体性、认识到不同主体间的动态关系及其深层联系,并以此为基础,介入到对普遍性问题的讨论中。这便是“以时代为观照”的理论意义。

长时段的视野还能帮我们穿透各种既定概念带来的非历史性壁垒。如从“天下”到“国家”的变迁,绝非是对“中国”这一认识的消解。恰恰相反,它体现了在“时代观照”下,中国自我认知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sup>①</sup>而这种转化和发展,必须在与周围世界的不断交互中才得以形成。在过去,我们用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语言来描述自我,并承认其超越时空的普遍性。这种理论的迟钝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且与近百年来,西方自由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及其相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密切相连。今天,我们对社会、政治、历史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进行批判与反思,以及对中国的发现,并非是要用一种中心主义取代另一种中心主义。而是希望恢复理论真正的活力,还原理论本身对多样的、动态的世界进行描述与抽象的能力。这个工作,需要将理论重新放进时空的维度中,发现其普遍性追求的渊源与演变,并亮明其局限。只有在对话中,理论才得以向未来推进。

引入了时间维度后,理论的普遍性开始出现松动,这与福柯式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讨论产生了共鸣。福柯采用了“真理制度”,消解了真理的客观性,并将之转化为一个由知识生产、规制、分配、流通、操作等社会行动构成的权力机制的结果。<sup>②</sup>知识因此不再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产物,相反,它与权力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塑造的关系。<sup>③</sup>这一认识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建构主义学者。他们的批判,多集中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学科。一些来自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者注意到,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美国社会科学”,并不像它所称的那样,具有普遍

① 习近平:《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② 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6, pp. 72-74.

③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Peregrine Books, 1979, p. 27.

的“国际性”。它更像是一个“霸权的学科”，一个自成体系但脱离现实的“断裂帝国”(disjunctive empire)。<sup>①</sup> 许多人也呼吁,要“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现“不同的”认识国际的视角。<sup>②</sup>

这种对“不同视角”的追求,似乎可以在“区域研究”提供的多样性“非西方”知识中得到满足。我们也能注意到,在“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热潮下,英语学界在 21 世纪初开始“发现”来自“第三世界”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自“东方文化”传统中的国际观念。<sup>③</sup> 然而,研究者们也敏锐地认识到,如果不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知识性的重构,那么来自“非西方”的知识则永远会在“区域研究”的名义下,徘徊在西方知识生产的边缘地带,为西方理论提供“经验性知识”。<sup>④</sup> 实际上,区域研究在西方学科建制中之所以处于边缘,与其政治性的诞生密不可分。在美国高校中,驱动区域研究落地的是诸如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在全球扩张的财团。在研究全球各地“人类个体及不同群体内组织行为”的现实需要下,他们不希望受到传统大学学科分野的限制,更乐意在问题意识驱动下,集合不同学科的力量,研究问题并着手培养全面了解“地方知识”的有生力量。<sup>⑤</sup> 现实驱动下产生的区域研究,向前追溯与 19 世纪在殖民治理与商业扩张需要下产生的欧洲“殖民地研究”、“帝国史”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向后,则接续了美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争需要下,由国家主导推动而形成的区域研究,并在冷战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西方区域研究,很难摆脱其作为“经验性知识”提供者的地位。其用以解释全球纷繁复杂现实的理论基本上仍旧是对西方历史经验的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名目多样的奖学金、学术项目、交换计划与训练项目的支持下,许多基于西方历史经验抽象而成的国家建设、政治组织、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观念及其理论,通过年轻学生、学者以及事务官僚,系统进入到“非西方”世界的知识空间。这些从欧美经验中产生的普遍性话语,很快取代了不同区域中既有的习惯性法则,成为政策制定者们越来越依赖的工具,用以佐证自身政策行动的合法性。在 20 世纪后半,即便是埃及、印度等地的反西方行动,都吸纳了极具美国中心色彩的“国家安全”和“发展”观念,并很快开始在各自区域内开始了霸权争夺的进程。这种现象反过来又确证了上述理论的“普遍性”,愈发牢固地将发

<sup>①</sup> Steve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gemonic Country, Hegemonic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2, 2002, pp. 67–85.

<sup>②</sup> Pinar Bilgin, “Thinking Past ‘Western’ IR?,”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8, pp. 5–23.

<sup>③</sup>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2007, pp. 287–312.

<sup>④</sup> Katarzyna Kaczmarek and Stefanie Ortmann, “IR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A Plea for Displaced Knowledge Abou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24, 2021, pp. 820–847.

<sup>⑤</sup> Zachary Lockman, *Field Notes: The Making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19.

生在非西方地区的政治实践,锁定在“经验性知识”的地位上。

## (二) 对区域国别的研究应植根于中国视角的制度性思考

今天,学者们虽然认识到了西方世界负责生产“理论性知识”,非西方世界负责提供“经验性知识”的现象,但是他们倾向将此归结为既有学科建制中,强大的保守性力量通过学科评审、期刊发表等体制性力量,强化自身霸权中心力量的结果。<sup>①</sup>这种批判潜在的问题在于,它虽然有效地发现并批判了既有普遍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但并未从认识论层面,帮助我们推动普遍理论向更平等的方向演进。因此,我们看到,基于这种批判而推演出的建构性方案,难免有文化相对主义色彩。用互不相通的多样性,来取消普遍性的理论及其政治。将西方中心主义简单化为一种以自然地理为边界的空间产物。进而,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霸权的思想解放,庸俗地理解为对“西方之外”文化与政治地理空间中思想资源收集癖式地发现。

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讨论,显然不能以这种文化相对主义为基础。因为,这种基于原子化个人假设的文化相对主义逻辑,无法给出一个权力细分的最终边界。这就使得对多样性的发掘可以被无限拆分,其造成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对一切集合名词及其所代表的共同体以及背后共识的消解。其逻辑结果,便只能是一种荒诞的、碎片化的、以“我”为中心的、无意义的世界。这种情形在今天的区域研究领域中并不鲜见。区域国别研究,的确是对他者的深描。体现这种深描“客观性”的重要方式,是需要隐去我们作为观察者的主体存在。然而,当我们假装成为一个超然世外的旁观者时,我们恰恰也不知不觉地迷失了自己。在这种伪装的超然中,我们或者不自觉地将自己幻想为被观察者的一份子,与研究对象产生了共情,产生了研究一国爱一国的现象。或者居高临下,站在由某种普遍主义话语支撑的“客观”立场上,对被观察者做出臧否。而这种为了体现“客观性”而刻意隐去的观察者主体,往往成为消解客观性的根本原因。因为,客观性本身作为一种知识的产物,依赖的是对某种特定普遍性的不假思索。

对中心主义的批判本质上需要我们对“客观性”做出思考。这种思考必须伴随着对主体性的承认与发现。爱德华·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一书中,提到了所谓“双重视角”(double vision)。<sup>②</sup>萨义德在书中时而用“我们”,时而用“你们”,也会用“他们”来指称巴勒斯坦人。随着这种代词的转换,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观察者萨义德,作为读者的我们,以及被观察者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真实存在的距离,感觉到了作为美国学者的萨义德,以及作为巴勒斯坦人的萨义德,在走进巴勒斯坦社会这个现实之后,两种自我间的游移与交错。这种“双重视角”将萨义德作为一名“参与的观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的面目坦然呈现在读者面前,将他自身的观察与思考,将他个体多种社会身份之间的游移与交错变成了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正是 不掩饰“双重视角”的萨义德,才能将封闭、

<sup>①</sup> Katarzyna Kaczmarek and Stefanie Ortmann, “IR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A Plea for Displaced Knowledge Abou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820–847.

<sup>②</sup>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金玥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6 页。

完结的文本重新打开,并融入到开放世界之中,成为这个世界有生命的片段。作为作者,也正是在这种不掩饰的文字里,才能诚恳地邀请读者,参与到这个充满多样性的复杂旅程之中。萨义德主体位置的认识与自觉,无法简单地用对巴勒斯坦“身份”的“认同”来概括。而更应当被视作是对单一身份定见的主动突破。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发现主体性?在引入了时空维度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对主体性的发现与承认,始终是在一个与他者相互构造的过程中展开。同时,这种相互的构造,也形成了我们对于世界整体秩序的理解。换句话说,我们在发现主体性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对世界普遍性的想象。而这种普遍性想象,也反过来加入到我们的主体性塑造。这种自我与世界,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互嵌便成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主体性任务的基础。我们今天的区域研究,既不是为了要成为被观察者,也不是试图将某种理想的形态强加于被观察者身上。我们是要在这个观察的关系中,不断认识并反思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积极介入这个世界的塑造。作为在时间与空间中生存的生命,我们也正是在这个不断地探寻与对话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立场以及我们的使命。我们从来不是面向历史的终结而生,我们是历史不断前进的组成部分。

通过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叠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对国际秩序、区域国别的思考,便不是简单地对“中国”与“非中国”做出二元的、排他的区分,更不是对“非中国”理论话语的彻底抛弃。而是要将“中国”这一共同体作为空间原点,历史性地去看中国与他者的相互构造。由此出发,我们看到现代中国国际秩序、区域国别思考的问题意识起点恰恰来自于对霸权秩序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对亚非拉去殖民独立运动的关心。这就使得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天然就与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其追求中国与世界的平等理想有着同构的使命。它所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普遍的战争、和平以及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全球的展开,便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这种对国际秩序变迁的关心,又与新中国本身的国家建设运动密切呼应。在冷战与亚非拉民族独立、团结运动中,中国通过有组织地社会调动、大生产、大规模群众教育、卫生运动,并结合国际间友好国家的团结互助,实践了经济、文化、政治的去殖民改造,并进一步发展了以“独立自主”为特点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而作为前半殖民地的中国,其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建设实践,也同时对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建构作用。基于新中国去殖民独立经验的考察,在国际关系领域,本质上是对国家在与全球秩序体系的互动中,国家综合“自主能力”的分析,以及国家“自主能力”差异对全球平等秩序构建的作用研究。

从中国视角出发对自身命运与现代全球秩序的思考,包含了对全球秩序关系中不平等问题的自觉。我们可以将这种不平等,理解为不同共同体之间的权力势能差异。权力势能差异的大小,直接影响了在竞争过程中,不同国家、社群、团体、甚至个人的策略选择。在国际关系中,对于身处低势能地位的地区、国家、群体而言,广域的合作与团结,恰是阻拦强势能倾泻,完成自保的唯一可能方式。

这也就意味着,在讨论共同体在空间中的竞争策略时,单一的国家可能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竞争单位。我们也有必要将共同体的合作、共生、互助现象,作为有机体能动的生存策略纳入讨论。

中国对区域国别、全球秩序的思考不单是对空间意义上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而是对霸权关系的反思。从霸权中心出发,对战争、和平与发展的理论与制度性思考,往往与自上而下的干涉主义、经济援助、全球治理等法律和技术话语密切相连。而相应的,中国表述国际秩序关系的政策性语言则更多倾向于围绕着“平等”问题展开。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多集中在对被压迫者的反抗,以及独立自主国家建设问题的关心上。从霸权之外的视角出发,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更呼应了新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从建国之初至今,随着全球局势的不断变迁,建立在“各国一律平等”前提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更在最近颁布的《对外关系法》中,继续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核心的秩序原则之一。在此基础上,我更乐意将中国实践的人民民主定义为一种赋权民主,它不仅包含了对本国人民的赋权,更带有在全球秩序体系中对大小国家平等赋权的理想。

1949年,《世界知识》杂志复刊。其复刊词中写道:“作为中国人来研究国际问题,怎么可以不拿中国作中心呢?”<sup>①</sup>这种“中国作中心”的认识,更应当被理解为对新中国主体性的发现。这也照应了1934年《世界知识》创刊词中表露的理想与关怀。“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因为她肩负着向“资本主义……竖起反叛的旗帜”的责任。这个由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用了本国和殖民地里整千整万平民的汗血和枯骨做基础”,构建起了一个以“民主主义,个人自由,国际协调”为外衣的“文明世界”,可是其“内面和底层却充满了丑恶肮脏、暗黑和崎岖不平”。中国的革命,则是“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开始向‘文明世界’竖起反叛的旗帜。”而这场反叛的目的,不仅仅是面向中国的,更重要地,它为建造“另一个世界”打下了基础。<sup>②</sup>

将普遍性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叙事中拯救出来。这需要我们将视野打开,将人类不同时空中对普遍性问题的思考,都纳入到讨论范畴之内。这也不是要简单地通过罗列的方式展现多样性,而是需要在人类整体性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动态地、语境化地理解多种普遍主义话语的此消彼长,相互纠缠。并在这个复杂的关系中,理解现代世界秩序的构成。中国的主体性,恰是在这个面向未来的创新追求中得以呈现。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赵 军)

① 本刊同人:《共同学习,相互教育!——代复刊词》,载《世界知识》1949年第1期,第2-3页。

② 《创刊辞》,载《世界知识》1934年第1期,第1-3页。